

# 我绝不与 这个世界 妥协

丘吉尔演讲集

怎么会放弃理想  
变成自己讨厌的模样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英] 温斯顿·丘吉尔◎著 陈钦武◎译



## 时间打败习惯妥协的人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努力奔跑才能挣脱枷锁，轻易妥协的人驾驭不了自己的人生

**我绝不与  
这个世界  
妥协  
丘吉尔演讲集**

[英] 温斯顿·丘吉尔◎著  
陈钦武◎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绝不与这个世界妥协：丘吉尔演讲集 / (英) 温斯顿·丘吉尔著；陈钦武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2

书名原文: Winston Churchill Speech

ISBN 978-7-214-20069-3

I. ①我… II. ①温… ②陈… III. ①丘吉尔 (Churchill,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1874-1965) — 演讲—选集 IV. ①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3572号

书 名	我绝不与这个世界妥协：丘吉尔演讲集
著 者	[英] 温斯顿·丘吉尔
译 者	陈钦武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装帧设计	异一设计
版式设计	书情文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jspph.com">http://www.jspph.com</a> <a href="http://jsrmcbs.tmall.com">http://jsrmcbs.tmall.com</a>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75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0069-3
定 价	42.00元

## 前 言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被人们普遍称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人”。他的逝世受到全世界千百万人的哀悼，在人们的心目中，他至今依然是大不列颠极负盛名的儿子。有关他的书籍和文章发行量之大，有增无减，公众想获得对他更多的了解，如饥似渴、贪得无厌地阅读他的著作。每年，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云集布兰海姆、查特韦尔、布莱顿和伦敦内阁作战部参观访问。“丘吉尔”的英语形容词Churchillian和Churchilliana都已列入权威的新版牛津英语大词典。皇家海军战舰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名字还成为香烟的商标以及大厦的匾牌。电影、电视系列片以他的生活为题材，甚至伦敦的音乐也把他的生活谱为主旋律。他的书籍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他的画作在拍卖行里高价出售；他的语录成为警世箴言。

然而在他著述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演说却至今未能集成出版。这本书正是他演说的集结。我忠心感谢卡赛尔的安·鲍伊德，她第一个建议我做这项工作，并不断给予我热情鼓励和帮助。柯蒂斯·布朗的迈克·肖在这方面也竭尽了全力并倾注了智慧。我还要向剑桥的耶稣学院戴维·雷诺深表感谢，他



曾以温斯顿·丘吉尔为主题和我作了多次令人难忘的谈话。他坦诚相见，这与他知识分子的慷慨同样令人钦佩。克莱尔·康德拉关键时刻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最后，我再次感谢林达学院。

DNC（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纽黑文

1988年除夕

## 序

温斯顿·丘吉尔是他那一时代最雄辩、最善于表达的政治家，他既是语言大师，又是语言的奴仆。他非凡的事业毋庸置疑地被当作他壮丽宏伟的内心独白。他日以继夜地把词语注入滔滔大浪之中，奔涌不息。这些词语具有鼓舞人、感化人的力量，同时具有振聋发聩、威慑逼人、怒骂申斥的效果。不管是私人交往、公开露面、内阁议政，还是下院辩论，或者是乘车船、坐飞机，或是在食堂、画室、寝室、浴室里，他都滔滔不绝地慷慨陈词。许多书和文章，数种国家报纸，不计其数的备忘录都有力地证实了他经久不衰的口才、无比的修辞天赋，以及他一生对于语言的情有独钟。从开始参加大选到1900年进入下院，直到1955年作为首相的最后两周，丘吉尔在使用语言方面可以说是万无一失的大师。

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位修辞学家，善于遣词造句，用词多半口语化。有些词在说话中频频使用，朗朗上口。正因为是一个演说家，丘吉尔才生气勃勃；也只有通过演说，他的话语才有极大、永久的影响。

丘吉尔同格莱斯顿一样，“演讲是他本身的素质”。他一生中的演说词集成书出版的量多于与他同时代的其他政界人物。选定出版的演说集达八部之多，远远超出4000万字。他使用过的词语，不只限于“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他们的好运”、“少数人”和“在终止时开始”已得到广为流传，还有“一如既往”、“铁幕”、“高层会议”以及“和平共处”已成为成千上万人的日常用语。正如丘吉尔自己所说的“只有词语才能永恒”，这



一肯切的预言至少对他来说是恰如其分、无可争议的墓志铭。

——

尽管丘吉尔对于口语的掌握已经达到无比娴熟的地步，但他绝非一个天生的演说家。年轻的时候，对他来说，成为一个出头露面的人物，常常发表演说，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个头不到五英尺高，略显驼背，薄薄的上唇，娇嫩的皮肤，人到中年发胖的腰围，可见他的外貌并不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他深感没受过牛津、剑桥大学教育的不足，一方面他一直感到知识的贫乏；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从来没有那种年轻人在大学论坛就各门学科即兴辩论的经历”。除了在公众场合作了些简短的评论之外，他根本谈不上掌握了即兴公开演说的艺术。最令人气恼的是，他的声音不浑厚、不动人，语言有障碍，有时口齿不清，兼有口吃。正如一位公正的观察者针对丘吉尔早年经历所说的，他是“一个中等身材、不出众的青年，说话口齿不清……貌不惊人”。

丘吉尔的演说之所以与众不同，是由于他不得不克服不利因素。他通过艰苦奋斗，长期苦学苦练，去掌握他选中的技能。他学习记忆克伦威尔、查塔姆、伯克<sup>①</sup>、皮特、麦考利、布赖、迪斯累利、格莱斯顿这些名家的最著名的演说词。他背诵他父亲的部分讲话，故意仿效他的穿着和风度。他勇于磨练，克服发音不清和口吃的缺陷，拜访了几个语音专家，心摹口练，坚持不懈，精选妙词佳句以避免日常话语中不谐调的节奏。他对着镜子摆姿势，纠正面部表情。自然，他早年已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还常常担心在下院会议上会脱口失言；就是在后期，大凡作重要发言之前，他往往担心有闪失，直到准确用词、绝无障碍时才感到满意。

首先，他必须在演说词的篇章上花费时间。不管是在下院会议的讲台

---

<sup>①</sup> 伯克（1729-1797）：英国辉格党政治家、下院议员，维护议会政治，主张对北美殖民地实行自由和解的政策，反对法国大革命。

上，还是对着麦克风说话，丘吉尔的演说既不是临场发挥、口若悬河的喷涌，也不是某个只经过一番模糊思索便发出的不连贯的大声疾呼。这些演说，也包括一些台词，都是正式的文学作品，预先经过精心制作、润色，才全文排发的。它们是彻头彻尾详尽策划的作品，运用了丰富的历史事实去加强论证，安排了井井有条的论据，直至最后撰写成长篇大论。这一运作的全过程，难免占据了丘吉尔的大量时间。他在下院的首次重要演说总共花了六个星期才完成，即使在二战最黑暗、最繁忙的日子，他对他的演说词也从来不敢敷衍塞责。有时演说会不尽人意，然而他很少有半点懈怠。

丘吉尔具有撰写演讲稿和酝酿演讲的技巧，这极大地弥补了他身体、气质以及智力方面的缺陷。尽管他基本上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他还要改变风格，以适应新的情况。他开始把吉本的庄重、滚动的句子与麦考利明快、对仗的句子及咄咄逼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在印度当兵时，他很感激伯克·考克兰，他是坦慕尼协会总部以外的美籍爱尔兰政治家，他的最佳演说比起威廉·杰宁斯、布莱恩还要雄辩有力。那响亮、高谈阔论的演说很快成为丘吉尔声调的特色，这是从小皮特和格莱斯顿那儿摹仿来的，他父亲伦道夫勋爵在抨击和谩骂表达方面明显是成功的一例。丘吉尔把自己的细微、幽默、蓄意平凡的特点加上异常活跃的混合剂，其结果正像哈罗德·尼科尔森指出的，“演说时神采飞扬与聚精会神，这二者异常引人注目地结合在一起了”。

此外，丘吉尔本身是一个遣词造句的真正的艺术家，一个自学成才的人，不亚于一名职业政治家，他的词汇量异常之大。在哈罗公学求学时他在其他方面并不突出，但对于军事美学、醒目的头韵、亮丽的词汇、明快的对仗以及闪光的警句特别有兴趣。就像他的绘画、他的演说充满生动的意象和斑斓的色彩。他喜欢简洁、有力、生气勃勃的名词，如“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他选用有感召力、肯切、有文采的形容词，如“寂静、悲哀、丰富、破裂”等。他能驾驭出人意料但又精心选择过的词。比如他在描述密西西比河时，用了“桀骜不驯，不可抗拒，慈祥仁厚”，其中非凡的形容词最





后突破了既定的头韵模式，起到了极好的效果。在他同时代政治家中，在杜撰给人不可磨灭印象的词语方面，他是一个无可比拟的能工巧匠。大罢工时代，他的评论《我完全倾向于在消防队和火之间不偏不倚》是有名的一例。而他后来把苏联描写成“一个谜语，用神秘的外衣包裹，居于暧昧隐蔽之中”是另外一例。这种无悔的决心、勤于运用与娴熟技艺的结合，使丘吉尔迅捷地获得英国历史上所有政治家使用的多数修辞手段。从一部著作到另一部著作，由一个危机到另一个危机，由支持政府到反对政府，他总与闪闪发光的词汇结伴。修饰，再使用反复试过的句型，以适应新的情况。1940年英国战斗机驾驶员参战，有名的颂歌中有这样一句：“在人类冲突的战场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把如此多的荣耀归于如此少的人。”这一诗句富有古典的简洁和仿佛信手拈来的完美。但是未定型之前却经过了反复的变更和修改。1899年他视察了奥尔德姆，说：“英国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也从来没有那么多的食物供膳用。”九年之后，作为殖民事务大臣，在评论非洲的灌溉工程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够以如此少的砖石结构蓄纳如此多的水资源。”当丘吉尔1940年正是一个大忙人时，他的言辞所以能这样轻盈、华美地流动，其原因之一是他储备了一个词句库。

这些语句可以随时遣上笔端，因为它们确切地表达了他真实的个性，也因为丘吉尔的演说不仅仅在运用修辞手法、语言表述才能，而且在公开演讲的技巧方面训练有素。他如此运用语言，因为语言可以生动直接地反映出他究竟是什么个性的人。他本人平凡的个性由每一个夸张的句子表述出来：简单、热情、无辜、不会狡诈欺骗，同时又富有浪漫、豪侠、斗勇、雄心勃勃且城府很深。正如阿斯奎斯·维奥利特的女儿所说的：“20世纪之交邂逅他时，听他的演说中没有虚伪、夸张、矫揉造作的东西，有的只是他自然形成的习语。他的宇宙建立在勇敢之上，他说的是这种宇宙语。”1940年维塔·塞克维尔·威斯特实际上也为这一思想感到慰藉，“一个人之所以为他的词汇所打动，原因之一是他感触到这些词语背后似乎有一个强大的堡垒在支撑着、运作着，它们绝非仅仅是评语所用的词语”。

出于以上原因，丘吉尔的演说很快就实现了显著的音韵和谐，成为训练有素的政治手段。的确，他在农村没建立起一个拥有地方势力的根据地，在威斯敏斯特没拥有一批他个人的追随者，他两度改变党性，他的判断常常有误，他政务管理方面的才能或高或低，他对普通人的理解十分欠缺。对于他的演说仅仅被当作他真实的手段这一看法实际上是有争议的。演说使他能博得作为一名年轻下院议员的声誉，使他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变迁中幸存下来，恢复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地位，使他开展独立运动反对绥靖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联合自由力量，发挥世界政治家的作用。利用演说他得以将自己的视觉以及他本人的个性完全倾注在人和事件上。他的演说具有独特庄重的特点。他用无可比拟的雄辩演说表达高尚的情感。不管丘吉尔的演说多么重要，他的讲话绝非只是趋时趋势，他是在为子孙后代说话。这部演说集的问世，强有力地证明他是多么成功地达到了他的目的。

## 二

然而，尽管丘吉尔的演说具有明显超验特点，实际上他的许多演说经历后来证明是无助的，也就是说，演说没能使他实现他成为首相的最高抱负。从本质上说，他的演说反而使他难于攀登社会生活的顶端，无疑，部分正是因为他闪光的词汇、优美的表演。他对自己在演讲中所表达的气魄具有不可掩饰的喜悦，在大部分卑琐无聊的人中引起了过多的嫉妒。就他大部分的事业而言，他的演说正像真正具有诱惑力和感染力的演说那样，不但没说服力，反而触犯和引起了部分人的反对。正如一名下院议员在1935年所说的，“每当那位大人演说……演说厅里总是座无虚席，并引起全场的关注和羡慕。他想让听众笑，他们就笑，想让全场骚动，它就骚动……然而听众并不心悦诚服，最后他还是遭到投票者的反对”。丘吉尔的演说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也有斥骂之词，过于真切又过多地反映了他的公开活动。那么丘吉尔演说的问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部分在于丘吉尔富丽堂皇的修辞扰乱了平静，人们平静的心理迅速被鼓动起来，去支持许多不同甚至矛盾的原因，而这一切仅仅为了去支持他的观点，这特点在他早期生涯中已很普遍，一直延续到1940年甚至更后。部分问题还在于他不稳定的性格和他探索性的判断完全缺乏真实的成分。还不仅仅在于他生性爱激动、好动，把接触到的一切事情的重要性夸大其词，更在于他的修辞似乎常常模糊了他的理论。是他的词汇左右了他，而不是他驾驭了词汇。尽管他的基本优点或弊端都会很快感染他，也无妨他施展修辞的魅力去表达一切政治意图。查理·马斯特曼发牢骚说：“他只确认一切能通过修辞手段启迪他疯狂的事业心的理论。”这一切发生得太经常了，丘吉尔对迪斯累里针对格莱斯顿的指控深有感触。迪斯累利说格莱斯顿仅仅是“深奥老练的修辞学家、沉迷于他自己连篇累牍的激情洋溢”。

接下去的困窘是：对于在下院戏剧性的演说、舞台艺术化的独白、不该使用的口吻、进行家庭对话似的议会辩论，凡此种种，他一概不能适应。按克莱门特·艾德礼的说法，这些演说是充满华丽词藻的表演，但是太庄重，太自负，过于精细，不是下院理想的言论，只是阐发个人观点给人以印象而已。议会记录的形式读起来极其豪壮，使后来人倾倒不已，然而却很少反映下院议员的心态，根本无助于辩论自身。好几次他没能预先正确预料议员们的心情，结果招致议会的屈辱，因为他的言辞使议员们感到乏味，再说下去无疑要惹来祸殃。早年贝尔福曾讥笑过丘吉尔，说他的演讲“气壮”，“他只是个不十分灵活的辩才”。到后来，艾诺林·巴范用了一个暗喻说，“他应当坐在轮椅上战斗，就像一门大炮”。

此外，丘吉尔漂亮的词句常常冒犯听众，招致哗然的批评，而他对于别人的情感却全然无动于衷。因为他的抨击（用贝尔福的话说）“既有准备又猛烈”，对此被他谴责的人不会忘记，也不能原谅。以前，在他盛气凌人、以功臣自居的讲话中，他罢免了米尔诺大臣的职务，后者是英国的贤良，无端被贬斥为“罪叛巴涅尔”。20世纪20年代，他粗暴地把拉姆·麦克唐纳

刻画成“没有骨气的奇迹”。不久后，他把甘地<sup>①</sup>丑化为“煽动性的中庙律师”，“印度教赤手空拳的托钵僧”。1945年大选时，他首次在党派政治广播演说中使用了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对工党敌手进行的嘲讽。四年之后，他对英国工党财政大臣克里普斯<sup>②</sup>发动了一次针对浩劫中战时联合体的一员盟友的进攻，该大臣在一次大战中曾是他战时联盟的一名盟友。艾德礼评论说：“丘吉尔是语言大师，然而一旦词语大师成为词语的奴隶，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词语背后没有别的，只有滥用的词语”。

丘吉尔的演说很多情况下带有悲观、启示性的阴郁色彩，令人难以置信。他用了一些过于渲染和生动的词语描述对于英国帝制复活构成的一系列恐怖威慑，如“布尔什维克”、“贸易联盟”、“印度的民族主义”、“纳粹分子”、“战后工党”和“原子弹”。“每个人自身都是非常可怕和十分危险的”，而他则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切。1931年他发出雷鸣般的呐喊，“让我们继续，”当时印度对英国构成了威胁，然而德国同样构成危险，“缓慢地向毫无作用的终结推移，慢条斯理地爬向深渊”。正像得奥·阿迈利评论的那样，这并不公平，很多演说起了副作用，缺乏建设性的设想，“很多威胁从最好的方面说是虚张声势，从最坏的方面说却十分具有想象力”。使用相近的词把威胁刻画得相去甚远，有时又十分难以置信，丘吉尔常常借假警告却贬低了自己危言耸听的虚夸。无怪乎议员们没注意到他发出德国重新武装的警告。议员们以前全听到过此类警告，感到非常厌烦。这一次，他们凭什么相信他正确？

丘吉尔的很多演说都具有极大的轰动效应，可见他的勃勃雄心。然而，确切地说，他的演说往往听起来空泛虚浮，言过其实，还充满自负，所以就

① 英·迪拉·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有“圣雄”之称，印度国大党主席（1925-1934），首倡“非暴力抵抗”，多次发动反英“不合作运动”，领导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印度独立（1947）后，被印度教极右分子杀害。

② 克里普斯：英工党政治家，参与创立新同盟（1932），二次世界大战后，任财政大臣（1947-1950），致力于战后经济建设，推行经济紧缩政策。



显得雷声大、雨点小。在那个战争年月里，无聊的世界上，1945-1951年这段社会主义时代里，他的夸夸其谈显得异常亮丽、丰富、生动、激情迸发。而在利顿·斯特维奇<sup>①</sup>和乔治·奥威尔那个时代，“宏伟气度”是没有说服力的。一名妇女听了丘吉尔在群众集会上吼叫，说他是“一个小蠢货，可恶之极，绝不是一名幽默滑稽的演员，不过是双手交叉、操着演说声音浊眉污须的势利小人”。当无线电广播开始响彻大会场时，他便越发超乎时空：作为一名广播员，他缺乏适于媒介、适于节奏、抑扬顿挫的谈话方式。像鲍德温和艾德礼这样的政治家，素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敏于适应国情，蔑视、怀疑那些大言不惭、玩弄词藻的演说家，无论在国家还是在下院，无处不胜过丘吉尔，这毫不奇怪。

丘吉尔演说的致命弱点是：演说内容虽与他的美德不一致，却具有奥林匹克水平。他的演讲都是作了精细准备的，这恰恰说明其演讲具有深思熟虑的拘泥特点。庄重的语言往往裹住了高尚的情操，却也能不失深奥，但是往往有令人不舒服的犯禁。演说中若玩弄词藻就不会有不断的创造，但无人不晓的是：丘吉尔常做出不可靠的判断；充满狂热的演说会使听众扫兴，分散注意力；易于使他们羡慕，却得不到承认，最大的弱点是：他的演讲纯属以自我为中心，不关注任何他人的意见。“他在议会厅中不过占住了一个位置，”乔治·兰士白利指责说，“但好像他有权走进来演说，又走出去，扬长而去，就像万能的上帝在说话。他从来不听别人的演说，只关心他自己的。”要是不打算听别人的演说，那么别人会听他的演说吗？

### 三

当丘吉尔在事业上大展宏图的时候，他演说的强与弱的平衡很明显地被打破了。早年从参加大选到1900年进入议会，直到1915年达达尼尔海峡的灾

<sup>①</sup> 利顿·斯特维奇（1880-1932）：英传记作家、评论家，以所著《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名人传》和《维多利亚女王传》而闻名。

难导致他的辞职，丘吉尔在培养作为演说家的才能时，力图震慑下院，这不可避免会有过错，会遭受挫折。他初期的演说词是粗制滥造的。他对他同党领袖布罗德利克和贝尔福的攻击十分激烈。有一次他在下院演讲时，只说了一半句子就戛然而止，完全割裂了它的语义；还有一次，作为次官第一次发表重要讲话，他的评论很不符合下院议员的心境，他的句子特别冗长，多有对仗，充满多音节词，以至听众对于他的实际意思多有费解。所用术语的隐晦既巧妙又可笑：“已经陈旧过时的词还允许陈旧到过时废弃，只能说明是修辞的无聊罢了。”

尽管如此，丘吉尔不懈地使用术语以及对于优美语汇的鉴别不久获得了重大犒赏。作为托利党下院议员，他往往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再爬一格升为自由党大臣时，便成了大气候了。他当上殖民大臣，就职德兰士瓦省，他在民主自治政府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可谓洋洋大观，不仅以细节见长，而且收放自如，视野宽阔。任海军上将时，于1914年演讲，他评价海军的讲话长达两小时，这次演说被广泛认作是透彻、无可辩驳之阐述的典范。劳合-乔治<sup>①</sup>明晰地评论道，“满堂喝彩”成为“他的鼻息”。同时他获得“讲坛坛主”这一令人敬畏的称号，尤其是在围绕“人民的预算”上议论纷纷、上院面临宪政危机之际，他获得这一殊荣。在一次卓有成效的演说中，他对于柯曾<sup>②</sup>大臣的所谓“一切文明都是贵族的杰作”及“维护贵族利益”等可悲的说法给予了令人难忘的回击，丘吉尔纠正说：“都是所有文明的艰苦努力。”

他事业的第二阶段是1917年再次上台执政一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作为劳合-乔治联盟的领导成员，他作了有纪念意义的演说，介绍1921年的军队预算，两年后声援了爱尔兰自由联邦。又作为财政大臣，在1924-1929年

① 劳合-乔治（1863-1925）：英国首相（1916-1922），自由党领袖，任财政大臣（1908-1915）时，率先实施社会福利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组成战时联合内阁，出席巴黎和会（1919），承认爱尔兰独立（1921）。

② 柯曾（1859-1925）：英国驻印度总督（1898-1905），任内整治文官制度，保护印度艺术和文化遗产，后任外交大臣（1919-1924），在解决中东问题、签订洛桑条约中曾起重要作用。



间所作的预算因其玄妙的表达和迎合盛大的场面而受到广泛的称赞。哈罗德·麦克米兰后来回顾道：“他在演说中显示了自己的机智、幽默、才华，正像他演说的技巧不受听众欢迎那样，他本人也拒不接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诸如分段引进义务、公路基金和定额改革这些既十分复杂又非常神秘的议题，对于高谈阔论的演说来讲不是理想的主题。人们越发感觉到，他的风格快要过时了，首先，他自身负有无法言说的诸多错误、厄运、不幸、荒谬的判断——托尼潘地、安特卫普、达达尼尔、查那克等地的困窘、总罢工，再多的演说技巧对上述事件也隐藏不了、挥之不去。内维尔<sup>①</sup>大臣1925年指出：他的演说熠熠生辉。人们成群结队去听他的演讲，他们说：“他的演说是伦敦最精彩的表演”。他继续说：“就我的猜测，他们仅仅把演讲当作表演，目前不急于相信他的人格，更不相信他的判断。”

迎着这一令人泄气的背景，丘吉尔打了20世纪30年代的两大战役，从最坏和最好两方面表现出他是一个演说家。1929-1935年他发动了被塞姆尔·霍尔<sup>②</sup>后来称之为“温斯顿的七年大战”，以反对印度比尔政府。这一战役决定性地表现出他经久不衰、随机应变的演说才能。但是很少有人在一个完全错估的事业上花费如此多的努力。正如斯坦利·鲍德温独具慧眼的观察那样，丘吉尔的固执己见基本上是用爱德蒙·伯克教化乔治三世的语言的。大多数由于他用凶残却无效的语言战争所促发的敌意：他穷追不舍地论证，作强有力纲领化的演说反对纳粹的威胁。因此他的演讲比起他后来五六年中所应该抓住的注意力要少得多。作为个人苦心发动的改革运动，对于表现议会的勇气来说，他的演说可谓登峰造极，然而演说的听众只占大厅的一半。丘吉尔于1938年伤心地直言道：“五年来我向下院讲述这些事，并没获得非常大的成功。”

① 阿·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英国首相（1937-1940），保守党领袖，1938年与希特勒签订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执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

② 霍尔（1880-1959）：英国政治家，曾任空军大臣（1920-1929），外交大臣（1935）、海军大臣（1936）等职，支持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1935），参与策划《慕尼黑协定》。

1935-1945年间，下院、全国、全世界更加集中了注意力。通过“伪造的战争”，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作了一系列生动有力、颇具战斗力的演说，在巩固信心、增强能力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只有当他成为首相时，一生期待着能主宰危难，他的演说才能才完全点着火，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才真正时来运转，这就是他的突破。这些问题在本质上都相应成为丘吉尔式的问题了。比如，胜利和失败，生存和毁灭，自由和专制，文明和野蛮。丘吉尔的演说，尽管常常有误，陈旧过时，却一度完全适应这样一次空前的危机——实际上是可怕的，但是内含着勇气。时代的戏剧突然地与他的声调里的戏剧等同起来了。1940年丘吉尔最后成为他朝思暮想要当上的英雄，他的词语最后都按他的意愿产生了历史意义的影响。

在他任首相初期，他的演说带有三种不同的目的，每一种都相应地实现了。首先，他经常向下院报告战争的进展——包括联邦政府的构成、法国的失败、敦刻尔克大撤退等等。他很多著名的讲话基本上都刊登在议会新闻简报上，往往在结尾处附加上振奋人心的一个段落。第二个目的是：联合强化国家的整体性。我们永远弄不清丘吉尔是否鼓舞了英国人民——这是他自己常常否定的，也不知道他是否只表达了他所有演说共有的、却失于言表的情感。他的演说从两方面来说通常是他的内心独白，绝无仅有地成为他与国家的对话。此外，第三个目的便是要使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人的舆论界相信英国的困境和摆脱困境的实力。自然，他的演说又完全是判断，罗斯福对他的演说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当英国一度处于防御阶段，德国任何时候发动侵略似乎都是可能的，而在胜利一向是不可思议的当儿，丘吉尔的演说却是最好的，往往是惟一可取的武器。爱德华·R·默罗<sup>①</sup>曾评论说：“他组织动员了英语语言，并将它投入战斗。”

很自然，要保持整个战时感情和言辞的高度激烈，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屈服还是战胜，这一明显而又简单的问题很快就会由同盟国的合作和战

<sup>①</sup> 默罗（1908-1965）：美国广播记者，曾在伦敦主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部的工作（1937-1946），后任新闻署署长（1961-1963），曾撰文揭露参议员J.R. Mc Larty的丑闻（1954）。





后重建这一更难应付、不需要勇敢的话题取代了。冲突在继续，因此后方就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远东接踵而来的失败导致对于丘吉尔领导的政府的批评，因为他“只有一系列演说的成功伴之以三番五次军事上的失败”。他还可以对目前全球战争状况作宏伟、全面的调查，他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几项无信心的行动；他发表伟大的演说颂扬劳合-乔治和罗斯福。然而对他来说要想简化、戏剧化那些复杂的军事、政治问题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同时他也不得不维护和纠正连他本人也不赞成的同盟国的政策。德国投降时，他发表十分得体的既动人又庄严地颂扬胜利的广播讲话，就连在胜利的崇高时刻，也禁不住对德·瓦莱勒的嘲笑，因为在整个敌对期间，后者保持了爱尔兰的中立立场。

欧洲一取得胜利，丘吉尔那种富有义务演讲的执著就中断了。在1945年大选中，他那个党的政治广播显得“令人费解、观点不鲜明，不具有建设性，并且话语冗长，以至从中形成不了具体印象”。作为反对派的领袖，他攻击政府的演说——以惯有启示的形式预测印度工业国有化，以及独立的最可怕的后果——当然不是一直都具有说服力的。他的演说依然无愧于伟大议会，有时他表达得情真意切。可是这些年中，他最伟大的成功是在议会之外、在英国之外得到的。在富顿和苏黎世，他的话语都是来自于新近被他们国家的选民罢免的平民阶层。他们习惯于丘吉尔集抑郁和振奋于一体的风格。但是他作为演讲人的身高、场所和计时的奇特、说话的内容，说明了他的演讲不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铁幕”背后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1951年丘吉尔又重新执政。那时人们的心境迥然异于14年前，他的演说无须那般鼓舞人心和温文而雅，比如无须要求“1940年所具有的魔力，到1955年一直有轰动效应”。丘吉尔本人到现在为止，的确是一名无聊的泰坦<sup>①</sup>。撰写演说词成为他的大负担，所以有时他用别人为他写好的演说稿。他老了，他的恐惧和他年轻时的步履缠住了他。他总是焦虑：在议会他还会

<sup>①</sup> 泰坦：（希腊）传说中曾统治世界的巨人族的一员。